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  
梅瓶  
研究



◎ 陆军  
——  
著

Chinese  
Meiping Vase  
Research

  
广西美术出版社

---

# 中国梅瓶研究

◎ 陆军——著

---

Chinese  
Meiping Vase  
Research



  
广西美术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梅瓶研究 / 陆军著. —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494-0856-6

I. ①中… II. ①陆… III. ①瓷器 (考古)—研究—中国 IV. ①K87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48940 号

---

## 中国梅瓶研究 (全二卷)

ZHONGGUO MEIPING YANJIU OUAN ER JUAN

陆 军 著

---

出版人 蓝小星  
终 审 黄宗湖  
策划编辑 梁秋芬  
责任编辑 陈宇虹 白 桦  
美术编辑 陈 凌  
排版制作 李 冰  
校 对 黄春林 王小野  
审 读 肖丽新  
出版发行 广西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广西南宁市望园路 9 号  
邮 编 530022  
网 址 [www.gxfinearts.com](http://www.gxfinearts.com)  
制 版 广西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雅昌文化 (集团) 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mm × 965 mm 1/8  
印 张 85.5  
字 数 117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4-0856-6/K · 86  
定 价 680.00 元 (全二卷)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作者简介



陆军，字子仁。

籍贯江苏启东，1967年生于广西南宁市。

1990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艺术系，获文学学士学位；2001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美学系，获文学硕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美学系，获文学博士学位。

先后师从李德利、李纪贤、陈绥祥、林冠夫诸先生，分别涉足中外雕塑、中国书画、陶瓷、工艺、饰纹等领域的历史和理论的研究，并研习经史、文字、文献、目录、考据、诗词等国故，以及美术考古学、中外交通史学等，对中国古代器物 and 饰纹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提出「纹学」的构想。同时也积极关注当代中国美术创作和文化问题，抱有批评、研究和实践的兴趣。

曾发表《20世纪中国雕塑回顾》、《20世纪外国大师论艺书系·摩尔论艺》、《中国艺术通史·元代卷·工艺美术》、《宋代梅瓶研究》、《纹化衰变与纹学渐兴》、《什么是我们的文化核心理念？》等专著和论文。

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美术观察》编辑部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本书系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2003年度青年基金项目。

# ◎ 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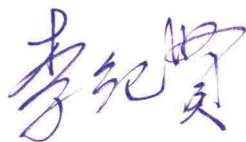
陆军君的《中国梅瓶研究》终于出版了，我衷心为他感到高兴，值得祝贺！

这个祝贺的话，早在大半年前他告诉我将要脱稿的时候就跟他说过，毕竟，我还比较了解他写这部书的前后经过，还有其中的艰辛。早在1998年，陆军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美术史论硕士学位的时候，他就和我讨论并设想以同一个题目来展开研究并撰写学位论文，我支持他。因此，他从1999年秋季开始便进入了这一工作的资料收集和研究状态。尽管他后来表示有力不从心之感而将题目缩改为“宋代梅瓶研究”，并由此拿到了硕士学位，但是他的“中国梅瓶研究”课题不但从未停止，而且越做越大、越做越来神，以至于有今天这样的丰硕成果。如此算来，他为这部“小题大做”的书稿耗费了整整15年光阴！

15年，这样一段时光在谁那里都不会是一个可以随便打发的时间，而作者也从一个青年人变成了中年人。现在当我们拿着陆军的这部书，也就看到了他在这段生命流程中做了些什么。

直观地看，他撰写了这么多文字、收集了这么多图片，文中还有大量注释，基本上可以断定他在资料采集上所耗费的心力。再稍作留意就不难看出，他的资料采集主要有三大类：一、近代以前的文献史料，包括正史、笔记、档案和文学史料等，直接取自丰富的古籍，还积极利用了这个时代数字技术所保留和传播的史料文件；二、以近代以来发现的考古出土物和相关的传世文物资料为主的实物史料，包括器物、绘画等，来源于各种各样的考古发掘报告以及丰富的海内外图录和研究资料集；三、现代学术研究成果资料，主要来自多种学术刊物以及集体的和个人的学术专著。作者的资料采集工作可以从此书附录三的参考文献中窥见一斑。记得当年我曾经要求陆军把《考古》、《考古学报》和《文物》这三份杂志从创刊至当时所刊载的不论长短、深浅，只要是与陶瓷有关的文章都必须看一遍，现在看来他的阅读量已经远远超出这个范围，我相信这一点会为他在考古学、文物学和陶瓷史等各方面打下一个比较坚实的学术基础。不过，陆军在史料研究上所花的功夫、所采取的方法及其开拓的眼界显然不止于此，如他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史、文学史、文字学以及考据学、诗学等方法的使用，应该得自于他转益多师的好处，这一点是应该看到和肯定的。

正因为如此，陆军在书里以内容详尽、形式丰富的多种史料为基础，对梅瓶这种器物做出了事无巨细尽皆网罗的翔实考证，深入讨论了相关的史论问题，仔细地绘制出中国梅瓶的历史发展脉络。由此，我们看到他对梅瓶的名称、功用等问题范畴的重新思考、辩证并提出了诸多很有见地的看法，也看到了他对梅瓶起源问题提出的分阶段、分层次的观点及其合逻辑的结论，还有他用其独特的样式研究方法努力描绘的中国梅瓶器形史。在此，我认为作者在研究上对问题的重视和深究是值得特别指出和强调的。他根本没有满足于占有资料和一般性的考据与



实证，他如果仅仅是这样做，那是没有出息的，而如果仅仅是这样来看待他和他的这部书，便是对作者的曲解。我认为，作者在极为丰富多彩的资料中着迷似的钻研和发现别样的问题，又将所有相关的问题一点一点地织造出一张错综复杂的问题网，再试图用他所构建的一整套有针对性的、系统的和整体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去解剖和重组这张史影斑斓的问题网络，并且对网上的每一个节点几乎都做了雕琢。要完成这样的工作，仅仅依靠史料的占有是无法胜任的，而是必须拥有和发挥理论的能力和智慧，应该说，陆军基本上是做到了。明确了这一点，读者可以试着到这部书里去寻找自己想要了解的以及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

不仅如此，这部专著还有更为内在的特色，即作者在审美上的敏感性和追求。据我后来了解到，这一点与陆军从小就喜爱涂涂写写并从未间断美术学习和创作实践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陆军的大学本科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完成了雕塑专业的学习，这一学业训练培养了他对造型的整体性和细节性的敏锐感悟，而且他在大学期间有机会接触到包括陶瓷、金工、石刻等多种工艺和材料方面较为系统的训练，这些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他日后从事纯粹学术性的工艺史论研究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感性基础。自其大学毕业以后的二十多年来，本书的作者虽然没有从事过雕塑专业的工作，却遵循自己的兴趣一直在研习中国的书法、绘画和诗文，对祖国文化传统的挚爱使他的审美能力和研究能力同时获得了陶冶与升华。现在看来，种种因素和缘由无不细微地体现在这部洋洋洒洒过百万言的书里。如作者关于梅瓶样式研究方法的分析以及研究结论的阐述和归纳，无不显示出作者在充分的资料研究基础上带出的审美态度和价值取向；又如他取径文学史和社会风俗史对梅瓶的名称和功用的研究，在扎实的史料功底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多新见，也无不与作者深入细致的审美品位有着必然的连带关系。可以说，这种研究方式和态度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治学传统中是一脉相承的，也与中国的学术传统相吻合，值得倡导和深入学习。

当然，目前出版的这部书不是没有遗憾的。《中国梅瓶研究》不单是陆军早年学位论文的延续，也是后来他申请的艺术学国家青年基金课题的成果。据他此前介绍，他的写作计划和原定框架至少还包括古代的中外梅瓶对比研究，不但有提纲，而且大部分写作已经形成了初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此次出版时没有得到呈现。学术研究并非总能尽如己愿，这是常见的现象，但类似的事情仍然不免让人感叹学术研究之不易。希望作者以后有机会补齐他的成果，我想这么理想的结果于作者、于读者恐怕都能算是一件快事吧。

最后我还要对作者表达一个好奇的想法：你以后还会做什么？

2014年秋草拟于北京寓所

◎

自序

## 梅瓶是什么

据笔者所知，在比较熟悉梅瓶的人眼里，它以优美的体态而受人喜爱。不过从以往的研究来看，人们对梅瓶的看法和持有的观点却不那么单纯。本书的写作就是从了解人们的观点开始，到深入探究“梅瓶是什么”，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梅瓶为什么被称为“梅瓶”？“梅瓶”所指的器物有过哪些曾用名？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有关的曾用名是如何转变成“梅瓶”的？“梅瓶”一名起用于何时？导致梅瓶名称发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这个转变又意味着什么？在此过程中梅瓶的用途发生了什么转变？梅瓶有过哪些功用？不同功用之间的关系如何？梅瓶名称、功用的变化与它“作为一种器物类型”的历史过程有何关系？这种器物类型的起源是怎样的？对其后续器形的衍化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其中的恒变关系是什么？从名称、功用、器形到装饰、材质、工艺等方面，梅瓶的历史都有些什么规律可循？它对于认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有何启发？

这些追问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而我还是愿意回到“梅瓶是什么”这个最不起眼的问题上，来谈谈下面的看法和本书的写法。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关心我工作的朋友们经常问起的，做了15年的梅瓶研究之后，我也时不时会对自己发出相同的质问，有时我都觉得它有点像个哲学问题。不管怎么说，能引起如此普遍和持久的发问恰恰说明它的基本性质——它是梅瓶研究首先要面对的，也是最终要解答的问题。“梅瓶是什么”要求回答的是“梅瓶”这个能指的所指。在笔者看来，梅瓶就是它的名实关系从缘起到衍生和不断变化而迄今不止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可以视作关于中国梅瓶名实关系的多层次、多角度的论述。

从“称名系统”的角度入手，本书对梅瓶现用名和曾用名的内涵以及诸多关系做了细致的辨析和讨论，作为论据的史料尽可能扩大到以往的研究曾经踩踏整齐的范围之外，论述的理路贴近了传统的考据。如通过宋元以来相关文学史料的梳理，笔者发现“梅瓶”原本并非器物名称，而是中国文人以瓶插梅的审美活动浓缩而成的审美意象。清宫档案则证明，最晚在清代康熙朝后期，“梅瓶”已经作为一个正式的器物名称而流行于当时的宫廷之内，以后也延续不绝。很显然，并不像以往人们所说的那样，“梅瓶”及其命名依据只是晚清到民国初期的市井臆造，但是这种观点在一百年来的中国古玩行以至于在陶瓷史学界中却是普遍流行的，要命的是，只要对后者追本溯源就不难发现，如此流行的观点从来就没有认真的史料梳理作为其流行的基础，更没有经过合理、有据的明确论证。所谓臆造，真不知所谓者何

也。再如，现在人们都说梅瓶的曾用名是“经瓶”，还有人曾竭力呼吁应以之取“梅瓶”而代之，但是通过实物史料和文献资料的对比和寻索，本书证明了始见于北宋晚期文献中的“经瓶”，仅指当时各式各样的酒瓶当中具有梅瓶形式标志的某些样式类型而已，并不包括当时流行的所有梅瓶样式。因此，尽管这个曾用名对于梅瓶历史的研究很重要，但它充其量只是梅瓶这类器物的命名史上的特例之一，而当时梅瓶的名称常例是“壶”、“瓶”这类含义更宽泛的名称，今人如要考虑恢复其“本名”，也不应该以偏概全吧。而笔者以为，今天我们仍应该以“梅瓶”来称呼其所指的器物，这自有中国文化史的道理作为基础。

名只一端，实则千万。作为一种器物类型的名称，“梅瓶”所指的重点在于特定的形式和特别的用途，因此对于梅瓶之实可以从两个主要的方面做重点研究，即功用和形式。除必须仔细寻找梅瓶名称的前身后世之外，还要深入探究这种器物类型的用途和形式上的来龙去脉。

用不明则义不清。明了器物的功用，是准确把握其名称与形制之间关系的纽带。任何一种器物的功用，无论是实用性的还是非实用性的，本质上都是人类所赋予的，这正是器物作为人造物的魅力所在，也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特别强调“器以载道”和“人文化成”的精义所在。在“人类赋予”这个意义上，古人赋予梅瓶以各种不同功用的过程，便也是赋予这些功用以“结构”的过程，由此我们看到了两大层面的梅瓶“功用”：第一层即“实用性能”，也就是梅瓶作为容器所被赋予的实际用途；第二层即“文化功用”，是梅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文化环境中，在一定的社会因素作用下，由人类的社会行为赋予的，是在实际用途之外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进而观之，梅瓶的文化功用又可以在两个层次中分为两种：一种是礼仪功能，主要体现在人间的祭祀环境和地下的随葬环境中；另一种是审美功能，主要体现在插花和陈设等活动中。从“功用结构”的角度出发，本书把上述内容分别称为本体性功用、礼仪性功用、审美性功用，并视之为一个历史流变的过程来分别研究和阐释。通常，人们都认为梅瓶原本属于酒瓶，对其本体性功用的研究也就止步于此了。但是历史要比今人的常识丰富得多，也微妙得多。本书在形式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考古材料、文献史料和前人的有关成果，推断滥觞之初的隋代梅瓶首先是作为香水瓶出现的，它只在盛贮挥发性液体的意义上与后来主要用作酒瓶的梅瓶构成功用类同的关系。在梅瓶越过形式滥觞期而迈入成熟期的过



程中，五代到北宋的梅瓶也开始承担其原本没有的礼仪性功用，由此打通了另一个关于幽明世界的文化领域。至于梅瓶的审美性功用，现在还不好完全肯定其肇端于何时，但笔者注意到，至少从金代开始，北方某些梅瓶的口颈部在装饰上表明了当时可能已经出现了作为陈设器的梅瓶，也就意味着梅瓶审美性功用的出现。有丰富的材料可以证明后两种功用的多种形式的存在，包括考古材料、古代图像和文学史料，等等。可以说从宋金到元明这样一个长时段之内，三个层次的三种功用在梅瓶之上一直是并存不悖的，其中有一些很平常也很有趣的文化机制导致了梅瓶审美性功用的加速演变，如用于插花的酒瓶所蕴含的象征机制，以及古玩化机制。通过历时性的逐层梳理，本书大致揭示了梅瓶功用结构日渐丰满的过程，其中蕴含的内容与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传统所强调的道器之辨存在隐蔽的关系。

形可变而制有则。梅瓶的形式问题是本研究需要解答的重头。器物的形式涉及造型和装饰，就特定类型的器物研究而言，造型是首要的和主要的，相关内容包括形制、器形以及器形的样式三个层次。形制是某种类型的器物所具有的共性特征，它以概念的形式存在，而样式和器形是器物形制在不同层面的具体化表征。在笔者看来，梅瓶器形研究主要就是把握其形制因素在历史展现过程中所具有的特征和规律，由此涉及梅瓶装饰的特殊性。梅瓶的形制，构成了所有梅瓶个体器形的基本规定性，它的存在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某一件或某一类器物称之为“梅瓶”，有些类似的器物至少在梅瓶研究的意义上可以被视为“类梅瓶器物”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是研究者必须正视的材料。至于器形，它是器物个体的表现形式，属于单体性的概念；样式则是器物群体表现出来的程式化类同特征的集合，是抽象性仅次于形制的概念。在讨论梅瓶现用名和曾用名内容当中，本书分两次对“抽象的”梅瓶“形制”做过不同角度的深入剖析，以此为基础，本书的下卷（第五至第十章）借鉴了考古学型式划分的理论和方法，分别以足底部和口颈部作为分类的二级标志，将中国梅瓶作为一个系统化的整体而总共划分为“十类样式群”，并以六章的篇幅对中国历代梅瓶的器形衍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因此，本书的附录一“中国梅瓶样式群分类与排序总表”，既是本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也是本书文图对读的重要部分。

本书对梅瓶器形的研究，尽可能广泛地占有了资料，但是资料的广泛性只是研究的必要条件，以下几点则是本书下卷当中值得介绍的内容：一、对梅瓶器形“起源”的研究，本书没有含混笼统地使用这个词，而是将其分为两个概念和两个阶段进行梳理和阐述，即“形式

的端倪”和“形制的滥觞”。二、经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所做的形制对比研究，将梅瓶的形式端倪期划定在新石器时代到隋代以前，又将梅瓶的滥觞期划定在隋唐时期，并从中分别拎出多条形式线索，讨论了梅瓶的滥觞期和成熟期之间的形式相关性，而且以隋唐梅瓶为坐标确立了中国梅瓶器形样式的第一类样式群。三、在着重对历代各朝梅瓶做样式分类研究的基础上，从样式群的兴衰规模和地域分布的差异性特点入手，考察和讨论了历代梅瓶都有所不同的主次源流，描述了梅瓶格局的形成和历史演变，对于这一过程中具有文化特色的官民趣味和雅俗风尚等内容也有详略不一的讨论。

除了形式和功用，应该说梅瓶之实还要包括材质方始较为全面。材质是一种器物的形式得以落实的物质基础，使之成为可见、可触的对象。作为人造物，在器物制作过程中与材质必然构成一体的还有技术因素，也就是充满了文化的整一性、融合性以及地域差异性和历史传承性的工艺。工艺不单是保证材质得以成形的技术条件，还是梅瓶的器形和装饰得以呈现其文化性、历史性、区域性等各方面特征的技术指标。材质和工艺共同使得梅瓶的形制按照一定的样式来显现出具体的器形，反之也只有在一个个可感可知而又充满差异的个体上，我们才能通过历史积淀和审美心理等机制的作用来探讨和研究梅瓶的艺术风格。由于中国的梅瓶最常用的材质是陶瓷，因此以往关于梅瓶的探讨主要是在中国古陶瓷史领域之内来展开的。从遗存实物来看，陶瓷当然是梅瓶的主要材质，问题是我们不能忽视和忘记其他材质对于中国梅瓶的历史造就作用。研究表明，中国梅瓶滥觞之初就是以非陶瓷材质的选择作为起点的，到了后期，贵重材质的选用往往意味着梅瓶功用从实用性跨入了审美性领域。

正如前文所言，本书是从梅瓶研究的学术史开始谈起，经过对多层次的梅瓶名实问题逐层加以考辨，探究二者间的文化性互创，笔者希望能对中国器物史的研究有所启示，也希望能有益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新创造。最后，笔者想用几句研究心得来结束本序，也可以视作本案的导读脉络。辞曰：

学关人心，究古观今；不废群言，不任一音；循名责实，古贤之箴；实分形用，材与工斟；依形辨名，酒经梅瓶；用变名转，化用造型。

序言	002
梅瓶是什么（自序）	004
绪论	
第一章 回顾与设想——梅瓶研究成果梳理和本书研究的说明	001
第一节 近代以来梅瓶研究史的三个阶段和基本特点	002
第二节 梅瓶研究在四个方面的成果	007
第三节 存在的问题与梅瓶历史的复杂性	023
第四节 整体性与系统性思路的研究设想	030
上 名用篇	
第二章 瓶梅与梅瓶——从审美意象到器物名称	043
第一节 从“称名系统”看梅瓶的名称	044
第二节 审美意象：宋元以来诗文描述的“梅瓶”与“瓶梅”	045
第三节 器物名称：清宫图籍里的“梅瓶”	066
第四节 “梅瓶”在近代向市井社会的传播	074
第三章 常例与特例——梅瓶的曾用名及有关问题	085
第一节 梅瓶曾用名的常例和特例	086
第二节 盛酒瓦壶：“酒经”的记载及文本研究	094
第三节 “酒经”的起源、传播与讹转	102
第四节 作为器物的“酒经”所指	116
第四章 器用与载道——梅瓶的功用及其结构性演变	129
第一节 从“功用结构”看梅瓶的功用	130
第二节 本体性功用：作为实用器的梅瓶	132
第三节 礼仪性功用：作为明器和供器的梅瓶	157
第四节 审美性功用：作为陈设器的梅瓶	191
下 器形篇	
第五章 端倪与滥觞——中国梅瓶的起源与器形样式的划分	205
第一节 梅瓶起源的两个概念和两大阶段	206
第二节 形式的端倪：对史前到北朝类梅瓶器物的考察	207
第三节 梅瓶形制滥觞期的六条线索	224
第四节 形制的滥觞：隋唐时期出现的早期梅瓶	237

第五节	中国梅瓶的器形样式和样式群的划分	246
第六章	转变与发展——五代、北宋和辽代梅瓶的格局形成	255
第一节	五代、北宋和辽代梅瓶考古发现概述	256
第二节	五代和北宋梅瓶器形样式分类研究	273
第三节	辽代梅瓶器形样式分类研究	314
第四节	中、南、北：多元化的三极格局	335
第七章	繁荣与分野——金代、西夏和南宋梅瓶的极致追求	341
第一节	金代、西夏、南宋梅瓶考古发现概述	342
第二节	金代梅瓶器形样式分类研究	357
第三节	西夏梅瓶器形样式分类研究	398
第四节	南宋梅瓶器形样式分类研究	403
第五节	中、西、南：多元化的新三极格局	430
第八章	混一与重组——向南方倾斜的元代梅瓶南北二元格局	447
第一节	从大蒙古国时期到元代梅瓶考古发现概述	448
第二节	元代梅瓶器形样式分类研究	458
第三节	南北二元格局和南方样式的兴盛	504
第九章	主导与互动——明代梅瓶的格局质变	515
第一节	明代梅瓶考古发现概述	516
第二节	明代梅瓶器形样式分类研究	524
第三节	中心化格局的奠定和官民风尚的相互影响	577
第十章	精致与一统——清代梅瓶的官样特征和审美化追求	587
第一节	清代梅瓶器形样式分类研究	589
第二节	官样趣味主导下的仿古和出新	605
附录		
附录一	中国梅瓶样式群分类与排序总表	615
附录二	宋、辽、金、元墓出土梅瓶图像主要资料梳理	639
附录三	参考文献	646
后记		656

中国梅瓶研究

上卷

Chinese

Meiping Vase

Research

绪论

第一章

回顾与设想

——梅瓶研究成果梳理和本书研究的说明

针对梅瓶的研究开始之前，本章先对以往的梅瓶研究成果做一番概括的学术史梳理，在此基础上，再对本研究涉及的理论、方法和一些基本观点加以论述。作为“研究前的研究”，这两个方面都与梅瓶研究本身关系密切，前者的清晰梳理和后的明确阐释都有益于比较准确地确定中国梅瓶研究的思维起点。

## 第一节

### 近代以来梅瓶研究史的三个阶段和基本特点

梅瓶开始引人关注，始于晚清，作为中国古代器物史的研究专题之一则晚到20世纪晚期，其间经过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转型和本案研究的深入。因此，本书把梅瓶研究成果的考察范围设定在20世纪初期到21世纪初期前后大致一百年之内，梳理内容主要包括近现代学术背景下海内外相关论著中有关的观点、理论和方法等。

根据相关成果的宗旨趣味、研究方式、知识水平等特点，一百年来的梅瓶研究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 一、第一阶段：从经验性描述到图文实证的近现代学术转型

这个阶段即20世纪前半期，从清末到1949年以前。这是中国近现代新旧学术混合与激烈交锋的时期，在基本观念、方法、思路和学术成果等方面均体现出与传统学术所不一样的时代特征。

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关于梅瓶的专文、专著，只有一些民间流行的谈瓷专书和极少量带官方性质的图录做了相关记述，大部分记录都没有具体内容。例如，初版于民国十年（1921年）的《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sup>1</sup>一书，提到了一些名为“梅瓶”的器物，没有细节描述，其“源流考”也不涉及梅瓶。只有以下三部述

1 邵蛰民辑著、余启昌增补、赵汝珍校勘《增补古今瓷器源流考》，十卷，初版于民国十年（1921年），增补再版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影印收录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古籍文献丛刊之《中国古代陶瓷文献辑录》（全十册）第八册4036~4038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2003年。也收录于桑行之等编《说陶》432~533页，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 2 [清]陈浏(号寂园叟)撰《匋雅》，上海古瓷研究会1923年影印书贵山房重刊本，影印收录于《中国古代陶瓷文献辑录》第一册157~372页。也收录于《中国陶瓷名著汇编》87~138页，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
- 3 [民国]许之衡撰《饮流斋说瓷》(十卷)，上海朝记书庄本，影印收录于《中国古代陶瓷文献辑录》第八册3719页。也收录于《中国陶瓷名著汇编》139~174页。
- 4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编辑《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第二册·瓷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节选本收录于桑行之等编《说陶》799~927页，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
- 5 如1916年罗振玉辑录印行的《古明器图录》就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延续中国金石学的传统路径而注意到以往学术界极少注意的明器，并做了初步的搜集、整理等研究尝试。但是明器自古就属于礼器范畴，故此书之作亦存在古已有之的渊源。

及“梅瓶”的公私撰著分别对梅瓶有关内容做了尚属粗略的记述，值得注意：

陈浏撰《匋雅》<sup>2</sup>(图1-1-1①、②)，成书于清末(1906~1911年)，单立“梅瓶”条；

许之衡撰《饮流斋说瓷》<sup>3</sup>(图1-1-1③)，十卷，民国初年印行，其中“说瓶罐第七”立“梅瓶”条；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编辑《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第二册·瓷器》<sup>4</sup>(图1-1-1④)，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今天学界所共知的是，《匋雅》是目前所知晚清以来最早用文字的方式将梅瓶的名称、形制和某些历史情况进行记录和描述的文献；《饮流斋说瓷》除了有类似的内容，还叙述了“梅瓶”命名的理由；而《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第二册·瓷器》成为近代以来最早以实物照片的形式载录“梅瓶”的第一部图录，不但收录了多件明清传世梅瓶，而且以“梅瓶”等不同的名称，对其基本状貌做了记录。无论是民间的“谈瓷专书”，还是官方性质的图录，这个阶段及梅瓶的著作均属海内作者所作，主要以经验性的描述对梅瓶的名称、形制、品种、流传和传世作品做了记录和鉴别，所及范围局限于陶瓷领域，预示了在这一阶段的梅瓶研究主要集中在陶瓷研究领域的学术渊源和视野特征。其中，《饮流斋说瓷》在结构和叙述上虽然仍属于传统式著作，但相比之下有了一定的系统性，反映了近现代学术转型的某些特点。《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第二册·瓷器》以图文对照的方式呈现了梅瓶的直观形象，使我们得以确定“梅瓶”所指，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这部图录的总序得知，此次展品的选择是由中英双方的专家“交换意见而甄选乃定”，编成图录的目的是“备参稽、资考证”，可以说是一部具备现代意义的资料图集。以上著作成为这个阶段梅瓶研究史中最重要的成果。

如果以当代学术眼光来回望这个阶段，也许有人会觉得那不能算是一个对梅瓶做出过研究的时代，或者以为上述成果只具有“准研究”的特点。果如此也并不奇怪，有关特点当决定于彼时学术和文化的状况。一方面，由于传统学术尚存余绪，中古以后始作为实用器而发展的梅瓶一向被归入匠技范畴，即使精美如明清所造亦如此，这就决定了此类文化遗产在20世纪前期是难以获得学术性关注和系统性的整理和研究的；另一方面，西方近现代科学观念与方法在中国虽然已有所传播，西方和日本的学者在乱局中也到中国来做过不少以探宝为目的的“考古”工作，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影响<sup>5</sup>，但此时的中国考古学尚处于系统建构的起步阶段，考古对象的重点是彩陶、甲骨文和殷墟等意义显著的学术工程，中古以来的器物也就不可能规模化地进入现代学术研究的视野。因此，这个阶段涉及梅瓶的著作大多仍局限在古玩谈瓷的圈子里，传统式的经验性描述仍然兴盛，科学式的现代学术体例和理论性阐释均普遍缺乏。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上述著作体现出来的近现代学术转型特征也是不能忽视的，若全面加以否定更是矫枉过正。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如果没有《匋雅》、



图1-1-1 《匋雅》等书

《饮流斋说瓷》对“梅瓶”名称与其形制的对应性描述，如果没有《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第二册·瓷器》以文图形式直观地展现梅瓶的名称与器形，如果仅凭目前所知晚清以前的零星史料，那么，后来的研究者便无法或至少有很大的难度就器物名称的“梅瓶”与器物类型的梅瓶建立起直接的对应关系。须知，这种关系是器物研究当中名实关系得以建立的基础，它对于器物研究的学术逻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20世纪前期上述三种图书的不同记录，此后的研究者将难以单方面依靠早期史料的挖掘而准确地解答梅瓶的名实问题，对梅瓶的研究会陷入更为复杂和难解的局面。仅此而言，就足以表明上述著作对于“中国梅瓶研究”的意义之重要，其所采用的文字描述、文图参照的形式以及有关的内容，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性质和学术价值。<sup>6</sup>

## 二、第二阶段：系统研究的初步建构

这个阶段从1949年到2000年，也就是20世纪后半期。1949年以后，现代的中国考古学进入日趋成熟的发展时期，考古发掘和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宽，促使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和相关学科（如古代陶瓷史）的研究在不断深入，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器物研究的理念、方法和基本方向，对于中国古代器用艺术的研究和认识不断深化，梅瓶作为一种自中古时代以来具有浓郁的中国文化特色和审美特征的器物类型，逐渐进入了学术研究视野，梅瓶研究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此阶段的后期，复杂的综合性因素导致有关的研究机构和院校对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各个方面都逐渐形成从未有过的认识需要和研究热情，考古界、文博界、工艺美术界乃至美术界，都陆续有学者和有关专家或多或少地在学术研究和复制实践当中，触及梅瓶这个原本不太起眼的主题。

与此前有很大不同，这个阶段出版了大量的考古发掘报告，越来越多地介绍各地遗存或发现的古代梅瓶，多有符合考古学规范的科学记录。这是以往的中国古玩传统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视野和知识积累，可以说，现代考古学完善了梅瓶研究的资料准备工作，为下一阶段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也根本性地改变了器物研究的框架，包括理论、方法和写作方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个阶段的梅瓶研究专文呈逐渐增多的趋势。依据研究成果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差异，这一阶段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期。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涉及梅瓶的海内著作以考古发掘报告和综合性的图录为主，包括出土物和传世品，只有少量的论著以或附带或专题的方式讨论过有关梅瓶的话题，深入系统的专门论述仍然不多。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者，常以零星的点拨藏于非专题性论著的字里行间，典型者如宿白著《白沙宋墓》<sup>7</sup>，对宋

6 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研究中国古代陶瓷史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梅瓶的基本认识可以说仍然基于《匋雅》、《饮流斋说瓷》的观点，如1991年由S. J. Vainker撰写的*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一书，在其Glossary（术语表）部分的“Meiping”（梅瓶）条中是这样解释的：“Meiping Literally, ‘plum blossom vase’, a tall vase with a wide shoulder and small mouth. The shape was first made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became a standard form in the Ming.”大意为“梅瓶，字面意为‘梅花花瓶’，是一种宽肩小口的高体瓶。其器形首创于宋代，而明代形成典型”。除梅瓶器形“在明代形成典型”之外，其他的看法均源于晚清、民国初期的中国谈瓷著作，由此可见《匋雅》、《饮流斋说瓷》等作品的影响。引文见：S. J. Vainker,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From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1. pl225。

7 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年。



- 8 孔繁峙《试谈明墓随葬梅瓶的使用制度》，载于《文物》1985年12期。
- 9 关于海外学者对中国梅瓶的研究，笔者掌握的资料还很不够，有待深入。现举日本学者长谷川道隆为例。他曾著文对辽、金、元三个朝代的“鸡腿瓶”（日本学界称为“长壶”）做过专题研究，其利用的资料主要是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现代中国考古学的有关成果，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观点，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从行文来看，虽然长谷川道隆视鸡腿瓶与梅瓶为二物，但对于二者属于相关器物的这层关系却应该是同意的。见〔日〕长谷川道隆著、杨晶译《辽、金、元代的长壶》，《北方文物》1997年2期。杨晶的译文在文章注释最末已注明：“本文译自东洋陶瓷学会《东洋陶瓷》1987~1989年，第17卷。”（112页）可见原作的成文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末。关于鸡腿瓶与梅瓶，中国国内学者大多数倾向于认可二者的联系，有些人甚至认为它们就是同类器物，只是形态有别而已。笔者以为，由于二者之间存在不可割断的关系，因此应该把鸡腿瓶视作中国梅瓶的一个分支，将其纳入中国梅瓶研究的范畴，故也认定长谷川道隆该文是对中国梅瓶研究的推进。
- 10 “现代中国考古学的繁荣”常常被表述为“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载于《考古》1984年10期。
- 11 20世纪90年代的梅瓶研究专文包括：郭学雷《上海博物馆所藏红绿彩梅瓶探讨》，载于《南方文物》1992年3期；刘涛《梅瓶探识》，载于《东南文化》1998年1期；刘静《古瓶盛酒后簪花，花酒由来本一家——宋代梅瓶、玉壶春名称由来》，载于《东南文化》1998年1期；钟凤文《梅瓶话源》，载于《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21日。
- 12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六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 13 桂林博物馆编《靖江藩王遗粹——桂林博物馆珍藏明代梅瓶》，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 14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六辑·后记》，375页。

代梅瓶的名称、器形、功用等问题做了准确而有影响力的阐释。一些专题讨论则多为局部性考证，代表作有孔繁峙《试谈明墓随葬梅瓶的使用制度》<sup>8</sup>。同期，海外如日本学者长谷川道隆也积极利用中国考古的相关成果，做了有意义的探索。<sup>9</sup>

随着中国考古学繁荣期<sup>10</sup>的全面到来，20世纪90年代成为该梅瓶研究第二阶段的最后酝酿时期。这十年里，各地墓葬和窑址陆续获大面积发掘，伴出大量各类材质、各个历史时期的梅瓶遗物，学术界在不断接触和学习西方的研究方法、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更多地注意借鉴中国文化的传统资源，因此针对单类器物的考古学、博物学、工艺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得以不断深化，梅瓶研究专文渐次增多，特别是在1998年前后，梅瓶专论开始形成发表规模，其中一些专题论文<sup>11</sup>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准。

### 三、第三阶段：多方位和多层面的关注

进入21世纪的十多年来，时间虽然不长，却是梅瓶研究的兴盛期，成为百年来梅瓶研究的第三个阶段。

2000年11月，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和桂林博物馆主办、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协办的“广西靖江王陵墓群出土青花梅瓶国际学术研讨会”（下文简称“桂林会议”）在桂林博物馆举行，同时将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结集出版<sup>12</sup>，还对桂林靖江王陵墓区出土的明代梅瓶也进行了专门整理，出版了彩版图录<sup>13</sup>。这是国内迄今唯一一次以一种中古以后的器物为专题而举办的大型国际性学术研讨会，成为最集中和最重要的一次梅瓶研讨活动。在“桂林会议”上，围绕明代靖江王陵墓区出土的大量瓷质和陶质梅瓶这一现象，与会学者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提交的论文“内容涉及有关梅瓶的称谓、源流、用途、造型、纹饰、烧造方法、文化背景等诸多方面”<sup>14</sup>，有不少论文对中国梅瓶的分期、分型做了研究。“桂林会议”和有关论文均力求在故史中求新知，使梅瓶研究获得极大拓展。继本次会议之后，桂林博物馆又于2001年春精选明代靖江王陵墓区出土的青花瓷梅瓶送至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名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并再次举办小型学术讨论会。在“桂林会议”的影响下，全国多家考古类和文博类媒体于2000年至2001年间积极组稿，先后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不同侧面的研讨都有进展。此后十年来，仍有不少关于梅瓶的专题文章陆续发表。

这个阶段对梅瓶关注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在规模上也是同期其他器物类型个案的研究无法比拟的，以至于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出现过一次小有规模的“梅瓶热”。这以后，中国陶瓷史学界作为考古学、文物学、工艺学、科技史学、美术学等众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开始出现对器物个案研究的热潮，对中国器